

社会科学本土化与江村研究的启示

耿 敬

内容提要 自清末以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史,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进行本土化探索的历史。表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应该在摆脱“西方中心”和“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束缚,重新反思本土化的历程,重新丰富社会科学本土话语体系的内涵中前进。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以江村调查为基础的“从实求知”研究传统,强调到实地中去发现真问题,并通过实地研究对理论加以检验和论证,进而推进中国社会科学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的实践告诉我们,这种“从实求知”的实践对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费孝通 社会科学话语 本土化 江村研究

耿 敬,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00444

社会科学本土化在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之后就逐渐成为一种议题。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尝试中,囫圇吞枣地接纳和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并以之为参照逐步建立起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发现并参照(甚至照搬)西方文明的成功经验,寻找一条民族发展的未来道路,改变积贫积弱的民族命运。然而,这种强烈的民族解放意愿又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显得过于急功近利,并将西方社会科学本身奉为圭臬,进而甚至以尊崇西学为荣,丢弃民族话语,刻意追求欧式的倒装句式 and 逻辑繁杂的复句,以娴熟地运用西方艰涩的话语表达来炫耀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正因为此,中国文明自有的认识系统也被逐渐解体,那些通俗的母语表达、大众化的生活概念和简洁的描述语句逐渐被欧式话语所置换,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失语”和文化危机。而社会科学本土化正是对盲目追随西方话语的一种反动。

一、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探索

早在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知识分子,虽然对社会改良与变革的认识有所不同,但为救亡图存都不约而同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把西方社会学看作一种变法维新的理论依

本文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课题“当代社会转型理论与实践的国际比较研究”的阶段成果。

据,并进而将西方社会学理论加以引介,或解读为“群学”,或解读为“人群学”,抑或解读为“仁学”。然而,当社会学以“群学”的面貌在中国出现时,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社会学缺乏较系统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出于社会改良与变法的现实需求,康有为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其实衍变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学的“他们自己的群学”^[1]。

随着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种与中国社会革命相结合的社会学开始出现,成为一种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指导理论。以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为代表所传播的这种社会学,或被解读为历史唯物主义,或被解读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1939年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学术中国化”讨论,这场讨论从重庆开始波及全国^[2]。这一源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讨论^[3],其目的是“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4]。当然,也包括对外来文化食而不化的反思和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这些或许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最早探索。然而,这些探索的目的取向不是寻求维新改良就是摸索社会革命的道路,究其根本都只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想的建构,还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属于学术意义上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

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是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正由于是引进的,所以就存在着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在1930年代,早期中国社会学者,如许士廉、孙本文、吴文藻、晏阳初等都曾涉及到这一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本土化主张的孙本文说,“如能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此诚今后之急务”,应该“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之特性”^[5]。1940年代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呼吁学术界共同来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并把它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中国的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上,即“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6]他目睹中国社会学模仿、照抄外国理论,使用外国教材,运用英语授课,西方学者把持和垄断中国社会学调查与研究的不正常状态,便公开站出来,大声呼吁学术界的同仁们共同起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并投身到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他还亲自用中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家庭社会学”、“人类学”等课程,编写汉语教材。虽然叶启政认为他们的倡议在当时未能获得广泛回应而逐渐沉寂^[7],但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吴文藻培养出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著名学者,初步开创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第一次唤醒了中国学术界打破西方学术霸权、建构本土话语的意识。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以社会学家为主^[8]。这在某种意义上被说成“是早先由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研究及

[1]丁乙:《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北京〕《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6期。

[2]参见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1939年第2期;潘菽:《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读书月报》1939年第3期;柳诤:《论中国化》,《读书月报》1939年第3期;逯:《谈“中国化”》,《读书月报》1939年第3期;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1期;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1期;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1940年第1期。

[3]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

[4]编者:《创刊献辞》,《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1期。

[5]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孙本文著《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1-20页。

[6]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社会学丛刊》甲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7]叶启政:《社会学和本土化》,〔台北〕巨流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09页。

[8]梁治平:《规范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双重挑战》,〔广西〕《中国书评》1995年第3期。

社会科学本土化传统的继续”^[1]。但是,“这种继续在理论上是贫弱的”(梁治平,1995)。对于刚刚恢复的中国社会学来说,一方面是要注重学科与人才的建设,另一方面则针对中国实际问题,因此便自觉地将学科定位为应用社会学,是“一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2]。“社会学本土化”虽然仍是一种常见的观点,但这时的“本土化”只不过是建构普遍的社会学理论提供更丰富的“个案”而已。

而同一时期,台湾学术界却掀起了一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3]。这场运动最初由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几位学者所发动,但很快便波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而成为台湾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学术运动。通过这场讨论,人们在两个基本的议题上获得共识:其一,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检讨、反思与批判。他们认识到,“在缺乏自我肯定与自我信心的情形下,长期过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特征,终于沦为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的附庸。”^[4]进而围绕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内在局限性、西方人文社会知识的相对性和时效性、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社会的内在关联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二,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性回溯与接引。反思和批判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要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性。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回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传统,希望通过对这一传统的梳理、分析与历史性的回顾,以重新建立某种连接和延伸^[5]。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本土话语意识的体现,多是强调从中国的经验研究出发,注重中国的传统,开始反思西方研究中国理论中所存在着的简化与偏差,但仍未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6]。对于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而言,如何去解释中国社会急剧变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可能比“本土化”问题更为实际和重要。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研究领域,甚至有学者称其为“万能的逻辑框架和分析路径”^[7],因此在政治学、新史学、法学、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等相关经验研究领域被广泛运用。另一方面,这一理论范式以及相关的理论如市民社会理论等,又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生搬硬套,其解释力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适用性上受到质疑。中国学术界开始“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求在保留节目单上添加新鲜的东西。”^[8]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不断尝试修正和丰富这一研究范式。

二、社会本土化问题的反思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对“本土化”问题进行全面的反思。力主本土化的叶启政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总的成果并不是那么耀眼,尤甚的是,整个运动似乎遭遇到瓶颈,甚至,令人有着后

[1]甘阳:《中国社会研究本土化的开端——〈江村经济〉再认识》,〔上海〕《书城》2005年第5期。

[2]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3]1980年12月,“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召开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1981年5月台湾召开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学”研讨会、1982年5月“中国社会学社”举办的“社会学在中国”研讨会、1982年6月由“中国社会学社”和东海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在中国:问题与展望”研讨会、1983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都毫无例外地把社会学的“中国化”作为研讨的核心论题。

[4]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北京〕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1982年版,第1页·序言。

[5]王东:《从“中国化”到“本土化”——台湾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学术史考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6]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7]复旦高研院“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学术研讨会相关报道.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ps/1940/2013/20130708110055195443963/20130708110055195443963_.html.

[8]F.W. 里格斯:《一部社会科学概念的百科全书》,〔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8年第1期。

继无力的感觉”^[1]。因此,对“本土化”问题本身的反思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反思本土化问题的语境。“不能否认,在我们的有关‘本土化’(或称‘在地化’)的语境中,有一个清晰可见的‘西方-中国’的结构存在。”^[2]在这一语境中,要么将本土化诉求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要么将本土化看作是“本土特殊论”的表达。

本土化之所以成为一种议题,往往是在经历了一个模仿照搬范例的过程之后^[3]。在运用西方的理论话语去对本国社会问题加以解释和分析时,随着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就产生了西方话语转化与置换,非此便难以进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主流学术话语体系,永远被排挤到边缘地位。在社会科学话语的“中心-边陲”关系中,非西方国家学者若想不被边缘化,就需要能够娴熟地运用西方的话语系统,以西方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视角参与到学术对话中去,并获得西方学者的认可与接受。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在这种将文化殖民主义合理化的学术背景下,非西方学者是否能够讲好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问题,是否能够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所谓文化殖民,就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扩张,以达到话语的扩张和精神的征服。当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被西方话语所控制和支配,就会致使本土知识分子以往熟知的话语知识体系边缘化,产生一种社会科学的“失语”症状。这不仅是民族语言话语的衰微问题,更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异化问题。社会科学“失语”标志着自我文化认同的话语系统的丧失。而本土化诉求之所以成为一个持续辩论的话题,则是由学术“失语”所引发的针对学术话语“中心-边陲”结构的反思,是对西方恩赐心态的揭示,也是一种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及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抗议和呐喊。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和台湾本土心理学的话语建构,就是面对西方文化殖民所带来的本土文化压力与失落,本土知识分子将研究目光转向本土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如果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诉求仅仅停留在文化解放的意义上或民族主义思想的表达上,本土化的结果不是自我边缘化就是自取灭亡。如果想作到针对学术界不公平的权力分配加以反抗,就必须经历一个先追随西方学术思潮然后再将各种思想揉搓而建构本土理论的过程^[4]。

社会科学本土化诉求,一方面是基于本土学者对具有特殊性的本土经验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基于经历本土学术实践之后所引发的对西方理论普适性的反思。在经验性与普适性的议题中,其实是预设着一个充满张力的“本土-西方”关系结构。在中国现代学术界,由于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本土的经验研究始终是中国社会科学关注和研究的主题。“无论是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的恢复机制),还是就其研究对象、学科特色,以及学术体制运行方式而论,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总体上属于一种应用性的中国大陆研究。”^[5]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诉求充满着“特殊性”迷思,即始终强调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和政治/经济体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迷思,使得本土学者在“本土人-外国人”的两分假定中产生一种认识,即本土学者“谙熟当地语言和文化”,这相对于那些“经常是机械概括、盲目搬用、总把异质的范畴生拉硬扯在一起并在语言翻译和民族史实方面屡出纰误”的外国学者而言,更具长处,更能切中中国社会的问题实质^[6]。而外国学者更容易使用某些“异质的思维”来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

其实,研究的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外国学者身上,同时也体现在本土学者身上。在“本土特殊性”的

[1]叶启政:《全球化趋势下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戏目》,载周晓虹、成伯清主编《社会理论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85页。

[2][5]陈映芳:《今天我们怎样实践学术本土化——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应用为例》,〔上海〕《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

[3][4][5]彭柯:《本土化:中国人类学追求新的关联与平等的策略》,〔南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认知基础上,中国学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只局限在一个熟知而特定范围内,将问题意识框定在特定的经验层面上,只注重中国社会中现实问题的分析与解读,建构起来的也只是一套与中国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系统。这种本土化诉求说到底只是一种内向性的防御措施,很难促成学术视野的向外扩展。这种内向性的学术追求,使得中国学者总是羞于同国际学术界对话,他们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关注,只是出于对国际学术界的变化和发展状况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并没有同国际学术同行建立真正对话关系的渴望,因此也无法从本土“特殊性”的经验研究中产生出超越特定人群和地域的理论体系。

正是过于关注“本土特殊性”问题,所以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在被引介到中国后,一种普适性的理论往往就要变成“中国研究”的应用性理论。当一种研究理论或范式对社会的差异性不具有足够的涵盖,无法对“中国研究”的社会现实问题给出恰当的解释和说明时,就可能面临着失效或无效的指责和否定。其实,“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不同标准和方式,二者其实并非绝然对立,”^[1]而片面强调“特殊性”的本土化诉求往往会混淆社会科学的问题。

三、江村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开始主持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这就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精髓与传统始终内嵌着一种“江村精神”。在中国社会学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呈现出一种江村研究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范式。正因如此,才会有学者在反思中国社会学的意义上强调针对江村研究本身的研究,提出建立“江村学”的构想^[2]。目前,若想将“江村学”提炼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系统,可能尚需更为繁复长久的理论研究,但江村研究本身作为一种精神和传统,确实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尝试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就是要到实地中去发现真问题。社会科学一直强调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是什么才是真问题,怎样才能发现真问题,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的。费孝通认为,这种认识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首先假定了“我们所需的知识是已经为前人所获得”,进而又“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是已经写在书本上了”。经过了现代学术方法训练并有着实地调查经验的费孝通,是无法接受这种假定的,因此就主张要“另开新路”,走一条实地研究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最初的研究方法往往是“问题式”的,所提的多是“人口是太多么?如何可以改少它?”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并不是一种基于客观事实的问题,很可能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判断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多不是科学的,往往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所以,费孝通认为,研究者不应主观地限定自己的研究范畴,这样会忽略某些客观事实,研究就“须对事实本身发生兴趣”^[3]。他以江村的童养媳现象加以说明:虽然童养媳制度“是亲属制度中的一部分”,但却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成是亲属制度问题而加以考察,若“要理解这种事实,我们不能不求诸他们人地的比率,经济上男女的分工(经济),婚礼的费用(礼俗),工作的学习(教育)等等,在我们工作时只有以整个对付整个。”^[4]若想找到真问题,一是不能仅仅停留在从研究文献中寻找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不能为实地调查设定范围。因此,他所体会的正确的做学问的道路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5],只有如此才能发现真问题。费孝通始终告诫我

[1]郭于华:《我们究竟有多么特殊》,〔济南〕《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第4期。

[2]2007年,刘豪兴从总结江村研究经验的必要性上提出“江学村”的概念(刘豪兴:《费孝通江村研究70年——兼述开展“江村学”研究》,李友梅主编《江村调查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16年,李友梅从提炼油一种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上再度提出这一概念(李友梅:《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江村学”》,〔上海〕《文汇报》2016年7月29日)。

[3][4]费孝通:《伦市寄言》,《费孝通全集》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第10页。

[5]张符生:《乡土先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们的是:不能仅仅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掇客”而只是贩卖西方的概念和方法,也不能抓不住“中心论题”地“唱‘独角戏’”,自说自话地以学者的爱好或兴趣去探索那些与中国社会实际无关的问题^[1]。

其次是通过实地研究不断检验理论的适合或恰当与否。在费孝通看来,“获得知识必须和知识所由来的事物相接触”,因为“直接的知识是一切理论的基础。”^[2]所以,任何一种理论或方法是否适合于对中国经验的解释,都必须要通过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检验来确定。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倾向,就是用中国社会生活的材料去填入西方社会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并“以为靠了些国外学者在实地所得的知识,可以用来推想中国的情形。”^[3]这就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洋牌话匣子”,不仅充斥着西方的理论、观点、概念,甚至“文章所可以引证一百个外国例子,而一句都没有提及问题所在的本国”^[4]。费孝通认为,文化并不是处处相同的,那么“我们要推究它不相同的地方,而同时亦不敢随意接受不是从本土事实中归纳出来的结论。”因此,我们也就不用借用“封建”之类的西方概念,去争论“中国文化现在是否尚是封建阶段或是半封建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概念加以描述和判断,而是需要我们自己“在实地详细看一下”^[5]。西方的理论的生成并不是源于中国经验,而套用其理论解释中国社会变迁也存在某些缺失或偏颇。为此,他以乌格朋的社会变迁理论为例,对其在中国社会的适应性提出了质疑,“第一他不能解释文化发生变迁的动力。……第二他跟着‘原子堆积’式的文化观,好像每个文化原子可以自由活动……第三他没有说明为什么文化各部分是需要调适的。”所以,他认为,“人家的经验”自有着人家“自己的基础”,如果我们“要有一套研究社会变迁的方法,我们只有根据实地研究正在变迁的社会的经验”^[6]。

费孝通认为,仅“坚持‘到实地去’的纲领”是不够的。“因为以过去的成绩来说,各人在实地的研究并没有打通一片。……我们只注意一地社会制度间的关联是不够的,我们在‘功能’之外尤须加以个‘比较’的观点。”他以瑶山和江村的实地调查为例,发现人口限制对婚姻制度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他认为,通过比较研究,“我们逐渐可以得到一些普遍的概念,而确定人口限制和婚姻制度的关系”^[7]。

费孝通的一生经历了“器用之争”、“中西文化论辩”以及儒家文化、小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争论,目睹了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思潮的涨落沉浮,但这种种种论争无不陷入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紧张的二元对立之中,无不是以西方现代性为视角或判准理解中国。”^[8]所以,任何一种西方理论是否适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与解释,也是需要通过不断社会实践加以验证的。首先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验证了人类学对于落后的“他者”研究方法,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相对发达的本土文化的研究;其次他通过运用社会变迁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在面对西方文化影响时,是如何发生现代化变迁的,从而验证了社会变迁理论是适合对中国社会变迁加以分析的。

第三是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中国科学本土化探索,一方面开拓了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的实地研究,另一方面却也出现了与国际学术界相对隔离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由于缺乏概念或理论创新,研究的问题甚至会避开了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其研究话题也始终难以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中心话题,从而导致中国本土学者“自惭形秽”地羞于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平等的对话。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很少关注普遍性问题,而逐渐“变得平淡无奇而且仅凭经验行事”^[9]。

其实,本土化研究并不意味着其研究问题的特殊性。虽然费孝通曾说“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

[1]费孝通:《理论与实地社会研究》,《费孝通全集》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2][3][4][5][7]费孝通:《伦市寄言》,《费孝通全集》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第9页,第5页,第9页,第4页。

[6]费孝通:《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载《费孝通全集》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8]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9]彭柯:《本土化:中国人类学追求新的关联与平等的策略》,[南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遍性”^[1]，但这只局限在面对空谈式学术风气而言。费孝通的中国研究始终具有着国际性的视野，一直在与国际学术思想的交流与比较中思考问题。当年的大瑶山调查，一方面他是想“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另一方面就是针对文化调适理论，想“从我们有限的观察中”来加以验证以便作出符合中国社会的解释^[2]。众所周知的《江村经济》，更是一部与西方人类学“他者”研究进行理论对话的作品。20世纪四十年代，当费孝通的江村研究被西方学者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现状时，费孝通本人则希望通过实地研究来纠正这种误读。他只是把江村当作认识中国社会的起点，在云南展开了新的调查，并希望“从实际工作中探索出一个从个别逐步进入一般的具体方法。……产生了是否可以分门别类地抓出若干种‘类型’或‘模式’来的想法”^[3]。为了将这些建立在本土实地研究所获得的认识介绍给西方，纠正西方学界对中国社会的误读，费孝通又将其研究成果《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和《中国土绅》译介到西方，并被收入英国 Kegan Paul 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

费孝通之所以努力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解读译介到西方，不仅是因为他有着外向扩展的学术视野，试图将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告诉给国际学术界，并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平等的合作、对话和辩论，同时他也始终在思考中国的文化传统在面对西方现代性问题时是否能找到某种可行性的解决之道。“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比较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核心问题”^[4]，尤其面对工业化以来所带来的新型的人与机器之间的异化关系，他一直在思考“我们的传统竟迄今没有人能应用来解释当前人类文化的危机”^[5]。晚年，他在倡导通过“文化自觉”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时，其实也是从整个人类的命运出发，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互补看问题，“我认为西方文化在强调人利用自然这一点上是有别于东方文化的，这个差别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的重要性”，因此其“文化自觉”并不是单纯地建立在本土问题的思考上，而是“要考察我们文化中的‘天人观’的独特性及对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可能有什么贡献”^[6]。其“天下”观更是从中国传统狭隘的“皇权”视野扩展到现代的地球村，“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7]。因此，费孝通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江村研究，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本土化取向，而是一种普遍化的策略，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真正国际化的必要一步。

余 语

自中国大陆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30多年的发展，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实地调查方法到社会问题的寻找，无不建立在费孝通本土化江村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说，江村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学的显著特征。如果站在国际学术界的视角，姑且将中国当代社会学称为“中国学派”的话，那么欲从中总结出“中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范式，就不能绕过江村研究的传统。

〔责任编辑：方心清〕

[1]费孝通：《内地的农村——纪念这七年艰苦的内地生活》，《费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2]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77页。

[3]费孝通：《云南三村》序，《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5]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

[6]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昆明〕《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7]费孝通：《孔林片思》，《费孝通文集》第12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